

王守华
铃木正 编

战后的日本哲学家

山东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本书是中日共同出版的《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铃木正、卞崇道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东京北树出版社 1990 年）的姊妹篇。正如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老前辈刘及辰先生，在该书出版时所咏：“（忆江南）献给璧、中日哲学家。文化交流桥梁架、相得益彰硕果诤、怒放友谊华。”两国哲学研究者之间的首次合作是良好和愉快的。

1989 年底，李今山先生与我分别接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抵日，作有关日本美学及安藤昌益研究的学术访问。有幸与铃木先生再次会面，在欢庆合作圆满成功的同时，李今山先生提出再度继续合作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铃木先生和我，以及当时在国内的卞崇道先生的赞同。并且卞先生根据中日双方的需要和可能条件，进一步建议以现代（战后）哲学思想作为再度合作的课题。在以后的书信往来中，这种意向被逐渐具体化。

1991 年 11 月，铃木正先生、堀孝彦先生为了准备中日共同举办安藤昌益学术讨论会再度访华，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进行座谈，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发表学术讲演。在这次访问中，经过磋商，决定题目定为《战后的日本哲学家》。原来的中方合作者全员不变。日方的合作者，因竹内良知先生于 1991 年 8 月 22 日去世，新增吉田杰俊先生（法政大学教授）与

堀孝彦先生（名古屋学院大学教授）。并决定由铃木先生与我担任主编。之后，中日双方分头进行了落实出版社的工作。

1992年9月，中日共同安藤昌益学术讨论会在山东大学召开。坂本尚（农山渔村文化协会——简称农文协——专务理事）和铃木正先生出席了会议，并分别在会上发表致辞和特别讲演。会后，坂本先生、铃木先生、卞先生与我，访问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与刘德久总编辑、金明善副社长、祁秀生责任编辑，进行了中日双方出版社、作者之间的磋商，达成了山东人民出版社与农文协共同出版《战后的日本哲学家》的协议。以后即进入分头研究与写作的阶段。

山东人民出版社是1992年中日共同举办的安藤昌益学术讨论会中文版会议录《安藤昌益·现代·中国》的出版者。农文协是日文版会议录《安藤昌益·日本·中国共同研究》的出版者。这次两社共同出版《战后的日本哲学家》，是两社早已存在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在日本叫做“战后50年”。对于“战后”这一同一的历史时期，两国使用了具有不同含义及所指的概念。在中国是指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稍后的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从此开始建设人民国家的过程。在日本是指15年战争的彻底失败，以及以后的民主改革和现代化过程。尽管如此，但本书恰值此时出版，不乏审观过去的时代和战后的意义。由于两国学者所处的社会条件及两国学术界情况的差异，各作者的着眼点、研究方法及文风的不同，所以全书的结构及体制很难完全做到一致。但都从各自的视角，对各自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描述与分析，都起到了反映时代思想，审观从战中到战后思想史发展的脉络的作用。

对于中国方面说来，具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及现代化建设借鉴的意义；从日本方面来说，具有反省过去和思索未来的意义。

本书选取的所论对象，都活动于从战中到战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可以反映战后日本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但是毕竟有数有限，仅为日本战后日本哲学思想之一斑。为了使读者能更清晰地了解战后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特请对日本现代哲学素有研究的卞崇道先生撰写了《战后日本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为本书的“代序”。并在书后附《战中·战后日本哲学思想年表》，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的内容。

希望本书能够与 1989 年出版的《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一起，成为读者了解日本近现代哲学的入门书。也希望本书成为进一步开展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铺路石。

王守华

一九九五年十月于日本川崎市冈上

目 录

前言	(1)
代序：战后日本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卞崇道 (1)
和辻哲郎——战前与战后的伦理学	
..... 堀孝彦 (牛建科译)	(19)
一、战前与战后的生涯和著作	(19)
二、对“国民道德论”的批判和再编成	(23)
(一) 再编“国民道德论”体系的初期构想	(23)
(二) 对以往“国民道德论”的批评	(28)
三、间柄伦理学——“日本民族精神”的圣化	(30)
(一) 对近代欧洲个人主义的批判	(30)
(二) 作为“人间”关系学的伦理学	(32)
(三) “日常世界的伦理”的意义	(36)
(四) 日本的宗教	(38)
(五) 《风土》与马克思主义批判	(41)
四、战中与战后	(44)
结论	(49)
中井正一——创造群众文化的战争生涯	
..... 李今山	(53)
一、中井正一的生涯——以创造群众文化为目标	(54)
(一) 从出生到大学生活	(54)

(二) 从担任《哲学研究》等刊物编辑到被捕	(55)
(三) 广岛的文化启蒙工作	(66)
(四) 从任国会图书馆副馆长到逝世	(67)
二、中井正一的思想	(68)
(一) 实践的集团的主体论哲学	(68)
(二) 空间论的美学	(72)
古在由重——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求道者	王守华 (77)
一、科学精神与自由民权精神结合之子	(77)
二、“唯研”时代的辉煌业绩	(81)
三、战后初期理论活动的重开	(97)
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进一步展开	(103)
高桑纯夫、田村泰次郎——作为战后意识的主体性论	
..... 铃木正 (刘文柱译)	(111)
一、提出高桑纯夫的原因	(111)
二、哲学思维的遗产	(114)
三、文学界主体性问题的产生	(117)
四、个性主义的正与负	(123)
五、“社会的主体”的双重性	(130)
六、文学家的直观——田村泰次郎	(137)
竹内良知——摸索日本现代意识形成的思索者	
..... 卞崇道	(145)
一、孜孜探索的哲学生涯	(145)
(一) 打开哲学的眼界	(146)
(二) 踏上哲学研究者的道路	(147)
(三) 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飞跃	(149)
(四) 西田哲学批判	(151)

二、竹内良知主要的理论观点·····	(153)
(一) 斯宾诺莎论·····	(153)
(二) 竹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158)
(三) 西田哲学观·····	(167)
鹤见俊辅——战后思想的日本型实用主义	
····· 吉田杰俊 (刘文柱译)	(177)
一、鹤见俊辅所体现的战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	(177)
二、作为方法论的实用主义·····	(181)
三、作为体验的战中、战后思想研究·····	(188)
四、作为实践团体的市民运动·····	(195)
五、战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202)
附录 战中、战后日本哲学思想年表·····	(210)
后记·····	(242)
执笔者简介·····	(244)

代序：战后日本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卞崇道

在《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出版六年后的今天，作为其续篇的《战后的日本哲学家》终与读者见面。为使我国读者了解书中选介的哲学家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地位，在前著中我曾写了题为《日本近代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的“前言”，概述了始于明治时代、止于二战失败期间日本近代哲学发生、发展的轨迹、源流及其特征。为了同样的目的，受王守华先生的委托，要我为本书写篇“代篇”。盛情难却，欣然命笔，献此拙文，以请教于方家。

一、日本哲学从“战中”到“战后”的转变

众所周知，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挑起侵华战争，中经1937年“七·七”事变，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全中国，1941年遂又制造“珍珠港”事件，对英美宣战，卷入太平洋战争，直到1945年8月15日战败。此间十五年在日本现代史上被日本者称作“十五年战争”（这是一种模糊战争性质的概念——笔者）时期，即所谓“战中”时期；1945年战败之后的日本历史，则被统称为“战后”时期。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界，一般多以

1945 年战败为界线，把此前的日本历史称为“战败前”（略称“战前”），把战后的日本历史称为“战败后”（略称“战后”），而没有把“战中”作为特别的历史时期划分出来。

基于上述对日本历史分期的考虑，我们在对日本哲学史进行分期时，往往把明治时代以前的日本哲学称为日本古代哲学，把始于明治时代、止于二战战败的日本哲学称为日本近代哲学，把战败后至今的日本哲学称为日本现代哲学或战后日本哲学。根据这一认识，我在《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的“前言”中，把日本近代哲学限定为始于明治时代（1868 年起），止于二战战败（1945 年 8 月）期间的日本哲学。这里自然包含“十五年战争”即“战中”时期的日本哲学。因此，若了解“战中”时期的日本哲学，可以参阅上著的“前言”，本文则以战后日本哲学为中心，略作评述。

但是，就思想史的发展而言，它的分期仅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从整体上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发展史都是一个不可绝对切割的连续过程；当然，在思想史的长河中，由于每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质的时代内容，作为各个时代精神之精髓的哲学思想也便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思想发展“中断”的特征，从而为我们区分断代哲学史提供依据。所以，不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哲学思想的发展都是这种“中断”与“连续”的统一。

那么，就“战中”到“战后”日本哲学的转变而言，它也具体呈现出现代日本哲学是一个“中断”与“连续”相统一的发展过程。以二战战败为分水岭，“战中”与“战后”的日本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清晰地显示出日本哲学史发展过程中的“断续”特征。“战中”时期，日本在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政治体

制下，对内实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统治，对外不断扩大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施以殖民统治。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下，作为其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日本主义”和“皇道主义”。在哲学领域，伴随着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化的加速，马克思主义遭受压抑、镇压直至被取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若不“转向”（变节之意——笔者），则被逮捕入狱；实用主义、实存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也逐渐失去生存空间。唯一受到政府青睐的是京都学派哲学之右翼——“世界史学派”，因为这个学派赤裸裸地为日本推行侵略战争的政策作哲学论证，在政治上起着维护天皇制国家的作用。不用说，是否相信并且维护天皇制绝对主义，是否相信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是“圣战”并为之献身，成为“战中”日本国民判断是非的唯一价值准则。1945年8月，日本天皇下诏投降，宣告日本在二次大战中彻底失败，从而结束了天皇专制主义的统治。战后，伴随着对战争的反省和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战中”的日本主义哲学、皇道主义哲学以及“世界史学派”哲学受到严厉的批判，“战中”的价值体系也彻底崩溃。在新的战后宪法体制下，日本走上了非军事化的和平主义和政治民主化的民主主义的道路。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实行学术自由的政策，各种哲学重登哲坛，竞相展开活跃的理论活动。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现代主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因此，我们可以说“战后”不仅揭开了日本现代史的新篇章，而且也带来了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根本转变。

但是，战后日本哲学与此前的“战中”哲学虽有本质区别，二者之间又不是绝对“断绝”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大体表现为两种类型，即保守思想的连续性与进步思

想的连续性（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它视角进行考察）。就前者而言，它主要指与保守体制天皇制的连续性相关联的“日本民族精神”的连续性。战后初期日本实施的民主改革是不彻底的，其主要标志是仍然保留了天皇制的政治体制，尽管战后天皇制被改变为象征性天皇制。因此，作为天皇制意识形态的保守思想也没有被彻底清除，并且在条件适宜时试图复活（60年代的“明治百年祭”、70年代的新日本主义和80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等）。就哲学家而言，本书选介的和辻哲郎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代表。他所建构的人间学伦理学体系始于战中，完成于战后，尽管以战败为分界线的“战中”与“战后”的日本发生了深刻的巨大变化，然而，和辻伦理学的基本内容都一以贯之，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也就是说，和辻认为以《伦理学》为中心的自己的思想体系以及整个日本人的日常伦理，到了战后也没有变更的必要。到了70年代，在众多的日本经营论中，都强调对“间柄”（人际关系）的尊重和“个人集团调和”的思想，是日本经营成功的一大要因，这种新日本主义论实际上是和辻思想的再版。到了80年代，不论是梅原猛的日本文化论，还是上山春平的深层文化论，都以和辻理学作为自身的日本文化论的哲学根据之一。所以说，和辻的思想典型地体现了从“战中”到“战后”的保守思想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的深刻的思想意义在于，它使我们在战后50年的今天清醒地认识到，模糊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的日本“战后50年国会决议”（1995年6月9日），以及连续发生的日本阁僚否定日本侵略史、把侵略战争合理化的“发言”，已经不是个人的历史认识和价值意识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日本（人）整体的本质的思想问题。

就后者即进步思想的连续性而言，它主要指以马克思主义

为代表，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等进步思想的连续性。在“战中”前半期，以“唯物论研究会”为阵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代表广大的日本人民的心愿，与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后虽然被压抑直至被取缔，但是，他们的斗争并没有中断，而是“作为地下水在流动”（森宏一语）。到了战后，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及其思想的传播合法化，他们继承战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更加活跃的理论活动。就哲学家而言，本书选介的古在由重和中井正一是其优秀的代表。古在是30年代“唯物论研究会”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现代哲学》（1937年初版）成为贯穿战中与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尤其是古在一贯坚持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立场与原则，这一点已经成为从战中到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整体转移。以古在由重为代表的进步思想的连续性，反映了日本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总体趋向，即使是在战后50年的今天，它依然是日本迈向21世纪的主导性思潮。

一句话，日本哲学以“战中”到“战后”的转变，是现代日本哲学史中“中断”与“连续”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好成为战后日本哲学的出发点。

二、战后日本哲学的出发点

具体说来，战后日本哲学究竟是从什么基点出发，向什么方向转变的呢？

战败唤起日本学术界对于包括哲学在内的以往日本学术研究的整个状况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提出了近代日本哲学中所

包括的三个方面的主要缺欠。一是哲学研究存在着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实践的倾向。这一点在学院派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学院派哲学在日本哲学界占居主流地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深居简出，追求学问的超然性，不去积极地研究现实的社会实践中提出的课题。显然，远离社会实践，偏执于自我内省所获得的只能是“主客相没，物我相忘”的“纯粹经验”，创立的只能是富有东方色彩的非理性主义思辨哲学。二是依存于西方哲学的非独立性。日本近代哲学不是在自身传统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明治初期以启蒙思想家西周等人导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理论为契机产生的。对于民族精神的独立性问题，对于东方及日本的精神传统所具有的现代意义等问题没能充分地加以考察，批判地予以继承。三是面对战前日本社会思想的日益反动化，当时大多数学者及其学问没能展开充分的批判和斗争，有的甚至由妥协进而为之作理论论证。通过反省，日本哲学认识到脱离社会实践，单纯依附于西方哲学而不去挖掘和发展根植于日本精神土壤的传统思想，是日本哲学及其哲学家对于法西斯主义，对于侵略战争缺乏有力的批判和斗争的根本原因。

这些反省既不能说是无益的，也不能说是充分的。关于前者，这些反省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日本近代哲学存在的问题，这既有助于提高人们对近代哲学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认识，又包含着反省者面向未来，试图克服过去的缺欠和弱点，开拓新的发展道路的积极愿望。关于后者，我们认为这些反省仍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水平上。日本现代化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这种矛盾又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因此，脱离对近代日本社会及其制度

的分析，单纯进行哲学反省是不可能深刻认识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的。

三、战后日本哲学的发展

战后日本哲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45年战败至50年代中期；第二个时期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至今天（1995年）。

在上述各个时期，由于日本社会经济发展乃至文化背景的不同，日本哲学的展开不论在形式与内容上，还是在成熟度上，都有所不同。从总体态势上看，第一、二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实存主义哲学为主流，在种种形式上表现出对立的扬弃，通过扬弃，不久又衍生出科学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等，各流派间既相互吸取、又保持其原本形态；进入第三时期，特别是80年代则表现出活跃的创造性意欲。

（一）战后第一个时期。占居哲学界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战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合法地位，1946年结成全国性学术团体“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创办季刊《理论》，翌年又建立了“唯物论研究所”，发行《唯物论研究》。虽说当时日本的大多数哲学家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都从不同的思想立场出发，倾向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当时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由列宁、斯大林代表的思想，即使引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也是经过斯大林时代的重新解释而体系化了的替代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如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几乎没有受到重视。尽管如此，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个鲜明特点，即不满足于对经典的训诂注释，

而结合日本的现实问题展开理论思索，他们在建构民主主义哲学的过程中，引发一场关于主体性的争论。主体性论者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以梅本克己和真下信一为代表，另一类以田中吉六和三浦勉为代表。梅本认为，主体性问题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焦点。唯物主义在实践上虽然重视主体（人），但在理论上却不加重视以至使之“闲置”起来，马克思主义如不填补唯物主义留下的这块理论“空隙”，就会不断成为唯心主义的温床。梅本建议，唯物主义应该通过批判地摄取实存哲学和西田、田边哲学中的“无”的逻辑来充实，三者取长补短，结合起来就是“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哲学”。以松村一人为代表的“民科”主流派哲学家撰文批判梅本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肯定物质的决定性的同时，总是强调意识的能动性，总是重视主体在认识客体、改造客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本不存在梅本所说的理论“空隙”；还有高桑纯夫的社会主体性论、田村泰次郎的肉体主体性论等。另外，田中吉六立足于武谷三男的技术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主体性理论。总之，关于主体性的争论虽然存在着理论讨论并不充分的缺欠，但其影响颇大，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还有寺泽恒信的《辩证逻辑学试论》（1957）、城塚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1995、改订版题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田边振太郎的《自然辩证法研究》（1949）以及三浦勉和黑田宽一的研究等。

实存主义哲学是战后初期日本哲学界又一大思潮，它以对抗马克思主义或者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姿态出现，引起人们

的极大关心。这一时期，日本哲学界着重于实存主义哲学的基础性工作，即翻译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大师的原著。截止 1955 年，在不到 10 年之间，克尔凯郭尔、萨特的全集、选集或专著几乎都被译成日文出版。随着日文译著的出版，关于他们的评介、研究论著也接踵问世。有的以实存哲学为线索，探讨哲学的现代课题；有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媒介，试图推进实存哲学的发展。

这个时期由于美军的占领，美国哲学思潮，尤其是实用主义也涌入日本，它以“思想的科学研究会”和会刊《思想的科学》为阵地，长期坚持理论活动。其中，鹤见俊辅建构的日本型实用主义，成为战后日本哲学的支柱之一。

（二）战后第二个时期。此间，在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分析哲学。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其理论研究。一是与前一时期相比，把视线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转向西欧的哲学思想，开始导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介绍了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阿尔杜塞、沙夫、科西克等人。二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进行实证的、多彩的研究。论者通过对初期马克思异化论的再探讨，试图确立与展开人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研究，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松涉的业绩，他在其一系列研究著作中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从文献学研究开始，因为自 30 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献有许多被歪曲，必须通过考证加以纠正。基于这一认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种版本及马、恩的手稿进行考证，重新编辑了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辑版》，日本学术界称之为“广松版”。不论在结构形式上，还是在内容解析上，“广松版”

都有自己的独特见地，成为日本大踏步提高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水平的契机。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造性的探讨。其中芝田进午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船山信一在《人学唯物论的立场和体系》（1971）中提出了人学唯物主义；藤野涉的《历史唯物论与伦理学》（1971）和栗田贤三的《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与价值》（1976），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论和价值论展开开拓性研究；柳田谦十郎对唯物主义伦理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古在由重等主编的《讲座·马克思主义哲学》（5卷本，1969）为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贡献。

就现象学而言，战前时期已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了初步介绍和研究，战后第一个时期从实存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海德格尔和萨特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日本真正的现象学研究，乃是始于第二个时期。6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复兴胡塞尔”的呼声，现象学研究因之活跃起来。以立松弘孝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翻译胡塞尔的重要著作，梅洛·庞蒂的著作也陆续出版。作为研究著作，新田义弘率先出版《何谓现象学》（1968），该书的刊行，使生活世界、地平线、被动性、生命存在、主体间性、身体性、显现命题、根底等主要概念在日本现象学论著中确定下来。随之，渡边二郎、辻村公一、田岛节夫、木田元等也在现象学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今天，在日本现象学研究者中间，既依据胡塞尔，又超越胡塞尔，摸索现象学新的可能性的尝试，正在以各种形式展开。

分析哲学在战后初期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进入60年代后则更加活跃。但是，此间的所谓分析哲学，在日本主要表现为“科学哲学”，即运用逻辑符号，对科学语言的意义论进行